

王船山的社會思想

汪 毅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 船 山 像

目 錄

一	小引	1
二	青年时代	3
三	战斗生涯	11
四	爱国主义	19
五	历史哲学	23
六	政治思想	35
七	伦理观点	45
八	烈士暮年	54
九	小结	61

一 小 引

十七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面臨着一個深刻的危機。這個危機的來源，主要可以分析為三個方面：

第一、由於明朝商品經濟的發達和國內外市場廣泛地形成，促使地主階級生活日益腐化，因而極端貪婪。他們不但為了要追求更多的貨幣，勒令農民以貨幣繳交地租、賦稅，實際上加強對農民的經濟剝削；並且，他們更敲骨吸髓地用各種超經濟的剝削方式來奴役農民，使農民生活進一步貧困，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也就益發尖銳。

第二、農產物的商品化，更引起了以皇帝為首的官僚地主階級瘋狂地兼併土地，造成明朝土地空前的集中。這種集中是循着官方與私室兩條路綫來進行的。明朝的所謂“官田”，在明孝宗時候（1488—1505年），已經佔全國私田面積的七分之一。而到了明神宗（1573—1620年）以後，由於皇帝濫賜諸王庄田，使民間土地大量被侵奪，“官田”竟到了無法再行搜括的程度。除了官方這種明目張膽的兼併，明朝官僚地主階級的私室兼併，也為中國歷史上所罕有。例如萬曆年間，浙江省權貴有侵佔民田到數千頃的。這種瘋狂兼併的結果，不特農民生活不下去，就連中小地主也多紛紛破產。

第三、以皇帝為首的官僚地主階級不但加緊掠奪土地和剝削農民，而且還刻酷地摧殘工商業。皇帝派出大批太監到全國各地征收礦稅、商稅和織造收入。這些稅監乘機任情地搜括人民，特別是對市民階級；稍有不遂，即加捕殺。他們遇有良田美

宅，就誣指下有礦脈，毀人房屋，掘人坟墓。“視商賈儒者，肆為攘奪，沒其金貨；負戴行李，亦被搜索；”甚至“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① 这种公开的搶劫与殺害，激起了無數次市民階級的反抗，成为明末農民大起义的先声。

明末農民大起义的掀起，標誌着这三方面矛盾所促成的中國封建社会深刻的危机开始了总爆發。在当时“人相食，从乱如归”^②的情势下，專橫猜忌、暴虐無能的官僚地主階級統治，遭到以中小地主和市民为骨幹的中間階級的嚴重抗議。中間階級對於農民起义的态度是惶恐和迷乱的。他們一方面坚决反对農民革命，估計到革命会損害他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痛恨官僚地主階級的統治。但这种矛盾的态度，由於官僚地主階級代表人吳三桂出賣祖國，勾引清朝侵略軍入关，而迅速明朝化。民族敌人深入國土这一事实，急剧地改变着國內的階級关系。農民与地主階級的矛盾相对地緩和了。这支原來是推翻明朝官僚地主黑暗統治的主力軍現在已站到捍衛祖國的最前綫。他們團結了全國各階層人民，共同進行轟轟烈烈的抗清斗争。十七世紀中國傑出的愛國主义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王船山（1619—1692年），就是在这样一个斗争中，承繼並闡揚了中國人民优秀的愛國主义傳統，成为世界文化史上一位光輝的巨人。

① 陈鶴“明紀”卷四十四。

② 戴笠、吳爰“懷陵流寇始終錄”，崇禎元年五月条。

二 青年时代^①

王船山生長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他本名叫王夫之，字而農，号薑齋^②。因为他晚年隱居在湘西蒸左的石船山下，后人都尊称他做船山先生。他於明朝万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17日）生在湖南衡州府（衡陽）城南回鴈峯的王衙坪。他們王家从江苏高邮搬來，这时已經住上九代了。王船山的祖先原來是做軍官的。到他高祖王寧，才开始教子弟学做八股文，希望子弟能够通过封建的文官考試制度即“科举”去做大官。这样一个小軍閥傳統的家庭，在他曾祖王雍时期，还是“颇务豪盛”^③。但是由於他祖父王惟敬的慷慨和揮霍，到他父親王朝諤手里，已不能不兢兢業業地过日子了^④。王氏的家風，似乎向來就屬於嚴峻的一路；加之王朝諤由生活环境鍛鍊出來的小心謹慎的性格，更为这个古老的礼教家庭，添上一份拘謹。王船山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教养下，逐漸長大起來的人。

在王朝諤的年代，明朝的極端專制已經达到它嚴重的腐爛

① 關於王船山傳記性的材料，作者主要根据的是清王之春編輯的“先船山公年譜”。地名、紀年，一仍其旧。只为便利讀者參照起見，在每个年号下附註了公元。

② 他的別号很多，根据記載有：賈薑翁、一壺道人、壺、一瓢道人、一瓢先生、瓢道人、双髻外史、櫟社外史、船山老人、船山老農、船山遺老、船山病叟、夕堂先生等等。

③ “家世節錄”。

④ “譚太孺人行述”：少舉公英卓，不事家人生產，徒四壁立。先君子勤素業，乃薄田僅供糴粥。

期。皇帝長年不見大臣，只憑太監任意處理國事，早就成為朝廷的慣例了。太監為了迎合皇帝的歡心，與大臣一起，更層出不窮地想出一切方法來搜括民財。自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開始，各大小城鎮，如：臨清、荊州（江陵）、武昌、新會、蘇州、景德鎮、昆明、松江、常州、上饒、福州、錦州等地的市民，都先後發生暴動，驅逐派駐在当地徵稅的、窮凶極惡的太監，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所謂“民變”^①。關外的滿洲族一天一天壯大了，又抱着入侵關內的野心。但，當時整個腐朽了的官僚地主階級，不論是在朝官員，或在野紳士，都只知道逢迎官長和魚肉人民。而一班中小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雖然有時對這種情勢感覺到憂懼和憤慨，不過，他們還是認為他們的出路只有向上爬，等到爬到皇帝的左右以後，再來進行政治改革。

王朝諤就是懷着這樣的雄心向上爬的。他生三個兒子：大的叫王介之，第二叫王參之，王船山排行第三，叫王夫之。王船山出生時，他已經快滿五十歲了。以五十歲的高齡，他仍然不忘情於科舉。他年輕時曾經考取過秀才，然而，再高一級的舉人，他只考中過一次備取——所謂“副榜”。到王船山三歲，他又去參加舉人考試，結果又只考中備取。他撫着自己滿鬢的白髮，覺得一生中再也沒有希望從科舉的正途出身，即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去做官了，於是，趁着明熹宗（1620—1627年）登極的恩典，他满怀羞慚地以舉人副榜的資格去北京的“國子監”讀書，期待三年卒業以後可以分配到一官半職，也算榮宗耀祖。然而，當時腐爛了的官僚機構，已不可能使一個遵守制度的人獲得任何官職；所以，他在北京讀書、候差前後達七八年之久，最後僅僅得到一個最低的官階“正八品”的空銜回來。這件事，極度損傷了王朝諤的自尊心。他從此隱居教幾個子弟，絕對避免和地方官吏與當

^① 參看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地豪紳往來。這一行動固然是因為他自己感到慚愧，不過，他和官僚地主的疏遠，不能不給少年時代的王船山一些有益的影響。

王船山幼年主要是跟大哥王介之讀書的。他和當時一班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樣，用心地學習了儒家的經典——十三經。他父親從北京回來後，更教他學做當時封建社會里讀書人考試所需要的文章——“經義”。王船山非常聰明，十四歲便考中秀才。接着，便以他卓越的才華，成為當地秀才羣中的一個著名人物。他十九歲和本鄉一位富人的女兒陶氏結婚。這時，他已經作為一個地方名人在社會上活動了。他參加了不少的文酒之會，結識了許多朋友。

在王船山結婚前後這幾年，關外的滿洲族已建立國號大清，在沈陽建都稱帝。他們征服了朝鮮、內蒙，從此可以自由地出入長城各口來侵掠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明朝統治集團對於清軍的侵略，不但不能給以應有的打擊，反而集中力量來圍剿那些實在生活不下去，被迫而起義的農民。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軍的聲勢，這時固然是暫時被鎮壓下去了，然而，那促使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由於官僚地主階級殘酷剝削所造成的災荒和飢餓，却正在威脅着更為廣大地區的人民。面臨這種緊張的局勢，我們不難理解到王船山和他的年青朋友們在一起，即使在喝酒做詩的閒逸氣氛中，也不能不意識到國破家亡的危機。他們不能不憤慨地談論當時官僚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和外寇的嚴重的威脅。他們覺得自己有能力、有責任來改革這樣一個腐敗的局面，擔當起祖國的危亡。我們只要看王船山和他的朋友們發起組織的一個詩社定名叫做匡社^①，就可以很鮮明地了解他們的這種抱負了。當然，他們實際上是不能有所作為的。對於他們來說，當前除了做做詩寄託自己的理想和感慨，渴望着從科舉而做官而“致君堯舜上”，此外還沒有什麼其他的道路。要他

們真正放棄向上爬的渴望那還必須有所等待，這一直要等待到他們鄉土淪陷與敵人面對面相見時，我們才可以看到他們毅然走進了人民的隊伍，站在戰鬥的前列。

在這一段時期，王船山寫了不少的詩。這些詩絕大部分都已喪失，現在保存下來的，只是他晚年在病中回憶起來的幾首。就在這幾首殘廢的詩篇里，我們還是可以發現有些地方是接觸到當時人民疾苦的。例如崇禎十三年（1640年），他大哥應皇帝的詔旨去北京的“國子監”讀書，王船山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

北過河濟郊，白骨紛戰壘。連歲飛阜螽，及春生餓子。盈廷騰謠詠，剜肉補瘡痍。痛哭倘上聞，猶足愧諾唯。持以慰親憂，勿為歌陟圯。

——送伯兄赴北雍

這裡提到了崇禎十二年（1639年）清朝侵略者沿運河深入到山東的濟南一帶所進行的屠殺，提到了廣大地區的災荒和飢餓，提到了官僚地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誠然，當時王船山的認識是不可能深刻的，他還是寄託希望於萬民所唾棄的皇帝，要他大哥“痛哭上聞”。然而，即使在這樣一個天真的希望里，我們仍然可

- ① 匡是匡正或匡救的意思。也就是說，他們要糾正政府的錯誤，挽救國家的危亡。明朝末叶，文人結社的風氣很盛。他們最初的目的，只是互相研究八股文的作法，選印一些八股篇章，來形成一種文風。同時，他們也借此標榜自己，以便在考試的時候引起考官的注意。後來到崇禎二年（1629年）復社成立以後，才提出“尊遺經，砥俗學”的口號，慢慢成為一種政治性比較強的學術團體（見吳偉業：“復社紀事”）。據陸世儀“復社紀略”里記載，在復社成立以前，“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為匡社，行世已久。”朱彝尊的“靜志居詩話”談到復社創立時也說：“於時云間有幾社，浙西有間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席社，昆陽云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朋大社；會合於吳，統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可見在王船山和他的朋友們組織匡社以前，早存在過一個匡社。但這兩個匡社，一是文社，一是詩社，並沒有任何歷史聯繫。

以体会到少年时代王船山的胸怀，不是斤斤計較个人的得失，而是充塞滿全民族的安危的了。

崇禎十五年（1642年），王船山二十四歲。他和他大哥同时考中举人，他並且以“春秋”一門考第一而中了第五名“經魁”。接着，他父親就命令他們兄弟倆取道南昌去北京等候進士考試。他們在南昌过了一个寒冷的暮冬。

这时，殘暴而腐敗的明末官僚地主階級的統治，在強大的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击下，已面臨它最后崩潰的前夕。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皇帝下令把進士考試延期到八月举行。湖南已經处在革命的动盪中了，李自成所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从开封南向，佔領襄陽、承天（湖北鍾祥）；張献忠所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从安慶出兵佔領蕪水。北上的道路根本阻塞不通，家鄉的情勢又顯得如此緊急，於是，兄弟倆商量以后，决定由南昌立即赶回家中。

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張献忠部克复了他們的故鄉——衡州，王朝諤被捕。由於王船山和他大哥王介之的声名，張献忠要求他們參加農民政权作为释放王朝諤的条件。这里，我們不难想像当时深受封建倫理思想束縛的青年們的行徑的。他們从受教育开始，就被教導着要尽忠，忠於明朝的皇室；要尽孝，即孝於自己的親長。在这种忠孝很难兩全的情况下，王船山决心牺牲自己來援救父親。他施用了苦肉計，故意把臉和手腕用刀割破，好像受重伤的样子，叫人抬到張献忠那里去。張献忠释放了他的父親。不久，他自己也通过一些曲折的关系而逃走。这件事情詳細的經過，在現有文献中記載得不够清楚，大概張献忠不久就离开衡州，因而也就沒有追究了。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進駐北京，明思宗（1628—1644年）朱由檢自殺。四月，清朝侵略軍入关，五月，佔据了北京。王船山听到这一連串消息后，非常悲痛，寫了“悲憤

詩”一百韻。以后凡每一个南明政权复滅，如弘光朝廷、隆武朝廷、永曆朝廷等，他都續寫一百韻的“悲憤詩”來寄託他愛國的忠忱。這四百韻的“悲憤詩”稿，和王船山有些著作一樣，可能由於后人怕清朝的迫害，都沒有流傳下來。

这时，全國整个的形势因清軍入关而激烈变化。明朝的宗室福王在南京建立了政权，这就是后来的弘光皇帝。原来推翻明朝官僚地主階級統治的農民起義軍，現在已用实际行动参加抗清。估計情勢，战争眼看是件長時間的事情了。於是，王船山便在家鄉附近一个荒僻深山——蓮花峯下，筑了一座小小的守攻庵，叫做續夢庵。以后兩年，他大都住在續夢庵中。

在這兩年，湖南、湖北的局面随着全國抗清局面的推移而日益呈現複雜化。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以弘光皇帝为首的南京小朝廷，就被清軍結束了它短短一年的寿命。明宗室唐王，虽然在福州接着称帝，改称年号为隆武，但实力薄弱得可憐。各地人民自發的抗清斗争普遍地掀起了。而李自成战死后所遗留下的大順軍二十多万人，更分成兩支，自动地和駐紮在長沙的明朝湖廣总督何騰蛟、駐紮在常德的湖南巡撫堵胤錫接洽，願意受他們指揮，共同抗战。兩湖的抗清力量空前壯大，但何騰蛟和堵胤錫都对農民起義軍抱着一定程度的猜忌，他們自己又都是自負“气節”的人物，彼此各不相下，因而沒有能够把这支抗清力量的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王船山看到这种情况，大为焦急。他固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举人，在政府沒有任何官职和地位，远够不上參預國家大事，然而他对祖國和人民命运的关怀，驅使他自动从家鄉跑到湘陰上書給他中举时的考官，当时的湖北巡撫章曠，恳求他居中調停。章曠当然不会重視王船山的建議，因此，他只有滿怀沉郁地回家。

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隆武皇帝的朝廷又被消滅。十月，

明宗室桂王称帝於廣東肇慶(高要),定第二年改称年号为永曆。这时,清軍也从江西攻入湖南。王船山的妻子陶氏就死在这一年。

这誠然是一个極其悽愴的环境。一切都变幻得如此快,如此惡劣,如此不可抵御!尤其在王船山的父親看来,他已經活到七十七歲,風雨飄搖,即將謝世。他一生是研究“春秋”的。这部被后人解釋为以“尊王攘夷”为中心的經典,在这个國破家亡的时候,翻閱起来,对自己特別是一种痛酷的鞭策。他感到他應該把自己多年積累的心得公开,讓这部古老的經典發揮出更大的智慧光芒,來坚定人們抗战的意志,明确人們抗战的使命。他三个兒子中,只有王船山对这部經典化过功夫鑽研,而在举人考試里,獲得这門考試的第一名,所以,他命令王船山遵照他对“春秋”的見解,編一部“春秋家說”。这部書,王船山为了慎重起見,直到五十歲才把它編成定稿。

永曆元年(1647年),清軍一方面大举向兩廣進攻,佔領了肇慶、梧州,逼得明永曆皇帝流亡到全州(廣西全縣)、武崗;一方面大举向湖南進攻,佔領了湘陰、長沙,逼得何騰蛟退守衡州,堵胤錫則把軍隊拉往湖北、四川边界。这时,王船山打听到永曆朝廷駐在武崗,便与他一个朋友夏汝弼商量,想从湘鄉徒步走过崎嶇的山道去参加抗战。那一年初夏多雨,整整一个四月,沒有一日天晴,他們被困居在湘鄉縣西南九十里的車架山中,一步也不能前進。王船山想念起那作为抗战象征,目前正被敌人追逼的永曆皇帝;想念起已經衰老而还受苦难的父母;想念起躲避在祁陽四望山上的大哥,和不得已留下照顧家庭的二哥;想念起去年才死的妻子和遺留下的孤兒!他做照唐朝愛國詩人杜甫、宋朝民族英雄文天祥作了“七歌”。在他这些割不断的思念里,最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他出走时,父親忍着淚对他的囑咐:“虽死不

辱犹生存！”他是抱着“虽死不辱”的决心去“从王”的，但是，現在綿亙不斷的雨，却像無數條鎖鍊把他鎖在深山。他憤激地唱出了一首哀歌，訴說自己的“頸血如泉欲迸出”，痛恨那些抗戰中潰逃的官兵，譏刺他們“殘兵如游蠶，債帥如駭鹿”；然而，他想到這種長雨可能對抗戰有利，只要這種長雨對抗戰有利，那末，他就是和他的朋友困死在這深山，也心滿意足了。

這一年五月，王船山的故鄉——衡州淪陷。湖南情況空前緊張。他和夏汝弼轉移到湘鄉縣南人跡罕到的白石峯上。清軍勢力繼續向南伸展，接連攻下寶慶（湖南邵陽）、永州（湖南零陵）。八月，他二哥王參之在家病死，他父親寫信給他：“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為念。”^①發出這信後的第二天，他父親也病倒了。於是，他和他大哥不約而同地都回到家中。他父親看見他們回來，極不高興，立刻扶病帶着他們到清軍勢力還不能達到的南嶽山頂隱避。十一月，他父親逝世於南嶽的潛聖峯。臨死前，怀着無限的隱痛，斷然放棄了傳統所最重視的“正首邱”的觀念，命令他們把他就地安葬，免得運柩回去；不使他清潔的遺骸經過被敵人所污穢了的城市。這位愛國老人最後的、極其動人的遺訓，對王船山日後所從事的对敵斗争，起着非常深刻的影響。

① “家世節錄”。

三 战斗生涯

战乱以来，王船山一直没有放弃过学术研究。他深深感觉到在祖国被敌人蹂躏的时候，一个爱国学者所负的重大的责任。现在，他父亲死了，按照封建礼制，需要居家守丧；他一时又没有可能去追随抗战政权，于是，便带着他大哥的儿子王枚，暂时躲藏在续梦庵上的莲花峰顶，一方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密切地注意着国家大势，等待着献身的时机。

果然，他所要等待的时机很快就降临了。

永曆二年（1648年），西南的抗清局势发生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大变化。明朝投降清朝的将官金声桓、李成栋，因为愤恨清朝对他们的猜忌与监视，於正月和六月先后在江西、广东举兵反正。同时，何騰蛟也开始在两湖发动大反攻，收复了全州、常德、东安、道州（道县）；并且会合了各地起义部队，进兵黎靖、武岗、宝庆、永宁、茶陵、酃县、安仁、常宁、郴州等地。这样，一即位便被清朝侵略军追逼的永曆皇帝，这时才喘息稍定，把中央政府重新建立在广东肇慶^①。

乘着这个机会，王船山和他共同发起创立匡社的好朋友管嗣裘一起，於十月组织了衡州人民的武装起义。他和管嗣裘都是“书生”，衡州又是敌人驻兵的重点，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要事先做好宣传、组织工作，要筹划安军队的配备和战士的给养，不难想像，是需要高度的坚毅与勇敢！这次起义，固然由于缺乏必要的支援，不久便遭受到挫败；但正如王船山自己所說：“与瞽战

^① 参看“永曆实录”卷一。

者，敗亦非辱。”^① 關於這次起義的材料，除現存“船山遺書”中的“管嗣裘傳”和“章靈賦注”里約略提到以外，在清朝統治者嚴酷的文字獄威脅下，什麼也沒有留傳下來。不過，儘管清朝統治者文網嚴密，只要這一英雄事蹟的本身不被湮沒，也就已充分證明：當時三十年華的王船山，是怎樣英勇地通過戰爭的考驗，願意為祖國神聖的獨立和自由，而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的了。

起義失敗以後，王船山冒着危險，忍着飢寒，攀越高山峻嶺來到了肇慶。他怀着滿腔的赤誠，以為從此可以展開救國的抱負，揮灑忠貞的熱血了。但當他一接觸到這個小朝廷的本質時，他不由得感到一陣強烈的、幻滅的悲哀。他對這個政權曾經想得太多美好啊，他把它看成是獨立的象徵，是祖國的前途。現在，他經歷千辛萬苦來到它的跟前，卻認清了它只是表面上打着抗戰的花招，骨子裡仍然是明末腐敗的官僚地主階級統治的延續！他堅決拒絕塔胤錫推薦他做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職，而即刻由肇慶轉到當時後方唯一有抗戰氣氛的桂林。桂林由大學士瞿式耜防守。瞿式耜和何騰蛟是在永曆小朝廷的官僚羣中，最具有民族意識和抗戰決心的人物。

就在這時候，何騰蛟所發動的兩湖大反攻，於勝利地收復永州、衡州以後，自己內部忽然起了糾紛。何騰蛟部將馬進忠和塔胤錫私人不和，塔胤錫命令馬進忠讓出常德防地，並將他統率的大順軍改稱忠貞營的，從川邊悉數調來，作為威脅。馬進忠力既不敵，心又不甘，便在退出常德時，一怒把老百姓全部趕走，放火燒掉整個城池。忠貞營來到後看見空城難守，只好隨之南下。寶慶等地的駐軍，不辨虛實，一齊跟着南潰。湖南州縣，變成千里一空。何騰蛟在衡州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知道湖南無法容納數十萬大軍，而且內部的糾紛也必須給以調解，便奏請永曆

^① “章靈賦注”。

皇帝，以馬進忠部專攻長沙，忠貞營則繞道出援在江西被清軍包圍的金聲桓軍，並親自到忠貞營去商量援贛計劃。可是當他到達湘潭時，忠貞營早已退去。何騰蛟進駐空城，不幸被他旧部叛將詐稱反正，襲入城中而被捕。後來光榮殉國。這時，清朝侵略者正以重兵進攻江西，南昌失守，金聲桓戰死；而湖南又失去這樣一個堅持抗戰的主帥，整個戰局的優勢，遂重新操在敵人手中去了①。

前線的形勢是一天天逆轉了。永曆三年（1649年）三月，李成棟在進攻贛州途中遇難。於是，江西全部淪陷。在兩湖方面，清朝侵略軍再度佔領了衡州、寶慶、永州、沅州（湖南芷江）、靖州（湖南靖縣）。然而，大局儘管如此糜爛，躲在肇慶的永曆小朝廷的官僚們，仍然無休止地結黨營私，爭權奪利。看到這種情況，王船山內心所蘊藏的悲哀，已轉化為一種近似絕望的情緒。他於這年夏天，回到已經淪陷了的故鄉。

到家以後，王船山就明了清朝統治者，絕對不會容忍像他這末一個“情終系主”的愛國志士潛伏活動的了。所以，他立即返回桂林。桂林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當時表面上固然是被重視的正派大臣，但小朝廷却不給他實權，他自己又畢竟是個儒生，魄力不夠，拿不出多少辦法。王船山在桂林的活動，只是交結了一些有肝膽、重氣節的朋友，其中最著名的是著“物理小識”的學者方以智。他們的交情很深厚，方以智死去以後，王船山還是眷念不已。

永曆四年（1650年），王船山三十二歲。他給父親守孝三年的期已滿，繼娶了襄陽人鄭氏。這時，清朝侵略軍攻下南雄、韶州（廣東曲江），永曆皇帝在肇慶躲不住，跑到廣西梧州。局勢可以說是空前危急，但小朝廷的官僚們，不但不竭力規劃抗戰，却

① 參看叶燮生“明末農民起義軍聯明抗滿小史”，人民出版社版。

把党爭也提到空前的高度。原來在永曆小朝廷的官僚們中，主要有兩個派別。一派是跟隨永曆皇帝起家的，以東閣大學士王化澄、太監夏國祥為首，號稱吳黨。他們包在皇室的周圍，每每誇耀“護駕”的功勞。一派是依附李成棟的威勢而煊赫的，以左都御史袁彭年為首，號稱楚黨。楚黨在肇慶非常得意，因為肇慶是李成棟的勢力範圍。當時，吳黨把楚黨的五个頭領稱為“五虎”。其實，五虎中除了袁彭年是個狡猾無恥的漢奸外，其餘四虎，不過是一些誇誇其談的文人，還沒有吳黨的頭領們那樣弄權賣國。永曆皇帝本人自然是袒護吳黨的，所以，他一脫離李成棟的兵力保護，把政府遷移到梧州以後，馬上就同意吳黨向楚黨所發動的全面攻擊，只特赦了袁彭年，其餘四虎一概逮捕拷問。

毫無疑問，不管兩黨的是非曲直如何，在這樣存亡的危急關頭，大興黨獄，總是損害自己，有利於敵人的。因此，王船山雖然知道本身人微言輕，但一想到國家的深重災難，他還是不顧一切地抱着“以君為命，死生以爾”^①的決心，跑到梧州去就行人司行人的官職，希望能憑這個微小的職位，在政府取得一點發言權，好盡自己的努力，來盡量挽回這個局面。他首先和他的戰友中書舍人管嗣裘，去見當時在梧州唯一有正氣的大學士嚴起恆，懇求他向永曆皇帝規諫。嚴起恆被他們的愛國忠忱感動了，依着他們的辦法去“匍匐泣奏”。可是，永曆皇帝却毫不理會。於是，吳黨開始攻擊嚴起恆，準備要置之死地。王船山忍無可忍，就憤激地上疏，請求允許嚴起恆辭職，他說：“勿使再中姦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②他同時一再向永曆皇帝控告吳黨頭領王化澄。這樣，王船山就卷入了黨爭的漩渦，成為吳黨的死敵。

在這個政治鬥爭中，王船山是站在正義一邊的。他是為國

① 王啟“行述”。

② “永曆實錄”卷二。